

晚明文人的

聂付生◎著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WAN MING WEN REN DE WEN HUA CHUAN BO YAN JIU

文化传播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聂付生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 聂付生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47-1930-2
I. ①晚… II. ①聂… III. ①文人—文化传播—研究
—中国—晚明 IV. ①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6052 号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聂付生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谭炜麟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7.25 字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930-2
定 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张 兵

人生常会有许多意外之事发生，为付生兄的《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写序，就是我在几个月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件意外之事。说是“意外之事”，实在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因为在我看来，写序者一般都应为文化名家，或是著作者的学术启蒙者和长者，例如导师之类。总之，应是那些学术领军人和德高望重者，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很不适合做这件事，所以一直拖延至今，未及一字。

然而这次在杭州，又见到了付生兄。他再次恳切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看来他请我为其大著写序，乃是出乎他内心深处的真挚情谊。如此高抬我，再要却之也实在不恭了。

和付生兄的相识是在复旦园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二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看稿，推门进来一位精瘦的年轻人说是要找我。我请他坐后，开始了交谈。他报了大名，并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后，乃慕名前来，恭请指教等等。说着，他从肩背着的一只黑色书包中拿着一本装帧得很不错的新书《冯梦龙研究》递给我，非常恭敬地说是要请我指教。在 20 世纪末的那一段时期，我的学术关注中心一度集中在话本小说的研究方面，对编纂过话本小说经典之作“三言”的冯梦龙自然十分感兴趣。现在看到这部学术新著《冯梦龙研究》，不禁对它的作者有了一种十分欣喜和敬仰的感情。由此也记住了“聂付生”这位同道的新学人。



大概是囿于学业的紧张，自此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付生兄也没来找过我，我也没有再见过他。然而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惦记着他。一个偶然的机，我知道他来到了杭州，供职于一所传媒学院（如今他被著名的浙江工商大学作为人才引进）。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丽的西子湖，和他钟爱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如此的契合，大自然必将孕育这位学子的新的创造力。我衷心祝福他在学术征途上继续前进。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杭州后的第一个春节的除夕夜，就打来长途向我们祝贺新年，并告知准备来沪上门拜年。大年初二那天，天气很冷，又下着小雪。付生兄践约来了，而且还带着他的太太来的，这使我们大为感动。邀他在沪小住几天，被他和太太婉拒。看到在雪花纷飞中远去的付生兄夫妇的背影，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在春节时从异地来家拜年的，记忆中付生兄是第一人，而且是和太太一起上门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我是打开了多年珍藏的茅台酒招待他们的，也算是表示了一点心意。

此后的每年春节，他都带着太太来看我们，平时也常常通过邮件嘘寒问暖，聊聊家常或工作以及遇到的困难和人生的困扰等等，乃至我几天看不到付生兄的邮件，心里就会很难受。也正因此，担心和他心心相印的我，在写作时笔下会带有主观的感情，从而影响读者对此论著的正确评判。——而这也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如今我却改变了主意，因为记录下这段朋友间的情谊，也正是我的责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在人生的交汇点上，或是人生的驿站中，一个真诚的朋友有可能会改变人的命运。从付生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有一次，我和他的老师之一的李时人教授夫妇曾有一次聚餐，席间说到过付生兄，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从以上一点短短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所说的精准。在我看来，“实在”两字非常精当地概括了聂付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的“实”，是指老实。做人作老实人，为文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而“实在”的“在”，乃指“在理”。做人处世懂礼貌合公德，为文讲求实证，用证据说话，不矫饰虚伪。而这一切，却正是聂付生的特点。文如其人，为人实在的付生兄，为文也很实在。不仅是为文，做学问也是如此。这部《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著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一书，是聂付生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两年的精心撰写之作。我在认真阅读后认为，可用立意新、把握准和视野广这九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

下面分别试说之。

立意新，这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留给我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清初有位著名的文学家李渔在谈到戏曲的创作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立主脑”。这“主脑”正像电脑主机中的芯片那样，是一部戏曲的灵魂。其实，何止是戏曲，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有其“主脑”在，而且这一“主脑”应该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渲染得以鲜明的树立在其中。我想，学术论著的撰述也应该如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应当在作者的论著中表现得尤其鲜明一点为好。因为与崇尚含蓄蕴藉的文学作品不同，学术论著更加讲究清晰明了。著作者在书中所要传达给读者的观点应是明确无误的，它反对晦涩隐约，曲里拐弯，唯有如此，才能让读者充分地折服和接受。

这部论著题作《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毫无疑问，全书的“主脑”，或者说是全书的灵魂和重点是在“文化传播”四字上。所谓文化，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智慧结晶。在历史的前进中，文化也处在一个不断地嬗变的过程中。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本来多元的文化在和社会上诸般事物的遇合、碰撞、冲突、融合的长期“化学反应”之中，也不断地获得了前进的驱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动态的变化而不是凝固的停止，是文化永远的特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始终认为，“传播”本是文化自身的题中之义。它在文化的动态前进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文化的传播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是搅动文化活水的内驱力。

也正因此，研究传播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在西方学界早就是一种非常热门的学问，也形成了一门享誉四方的学科。然而，在我国，“文化传播学”的真正得到重视，只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在作者撰写这部论著的时候，国内的“文化传播学”基本上还处在起步的时期。我们能读到



的相关书籍十分有限。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陈列的大多是学者们翻译的外来著作，属于我们自己的、经过认真研究的论著寥若晨星，更不要遑论哪些系统阐述“文化传播学”的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了。所以他选择“文化传播”作为在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的课题，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勇于攻坚的学术勇气。

作者在这部论著中所要研究的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这就更让人要刮目相看了。前几年，他集中于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研究，并有论著面世。冯梦龙，当然是属于“晚明文人”之列，这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学术“转型”似乎是顺理成章和轻车熟路的。可是，从冯梦龙的个案研究走向“晚明文人”的群体研究，其间又要涉及到哲学、经济、甚至是政治等各个领域。就文化本身来说，除了小说之外，还有戏曲、散文等等，另有中国出版史、印刷史、教育史乃至是网络传媒等方面知识的积累。这对于付生兄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两年时间，他可是全身心地扑进了图书馆，从早到晚，在孜孜不倦地吮吸着智慧的琼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论著，就是他的辛勤和汗水的见证。如今，当我捧读着这部论著的时候，眼前常会晃动着一个清瘦的学者的身影，在图书馆的桌凳上，似乎还会闻到付生兄留下的汗渍味。

艰辛的攀登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正如作者所言：此书“以晚明文人的文化心态作为晚明文化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针对影响晚明文化走向的几种文化心态如情本心理、王学情结、闲适的生活态度等一一剖析，以期阐述晚明文化形成的主观原因；然后，从传播方式的选择和传播媒体机制的生成等方面阐述晚明文化传播的内驱力。最后，以世界的视角进一步比较中西文人在传播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异，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对晚明文化的深刻影响等”，读完全书，相信读者都会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在历史上，我国的晚明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除了在整个历史之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外，还有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已经引起了学人们的注意，撰写了许多有关论述晚明社会的优秀的学术论著，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文学的更多。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是文化传播学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聂付生的这部《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是研究晚明社会文人文化传播学的第一部论著，具有学术拓荒的性质，充分地



展现了它的前瞻性。其立意之新，足以启迪后来者的智慧，导引学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把握准，这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留给我的第二个极为鲜明的印象。历史已经证明：文化的传播几乎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同时发生的。以文学而言，诗的创造差不多和“歌”同步。人们在劳动中和劳动之余，需要渲泄各种各样的情绪，而诗恰能较好地表达这类情感。它产生后，通过“歌”的形式可以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文字产生之后，诗除了吟唱之外，还可通过文字（较早时，把诗刻在竹简上等方式）而得到传播。后来人们发明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文学的传播载体又有了新的更为迅捷便利的方式：书籍。这在我国明代之前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然而，蒙古人的铁蹄又严重地摧残了文化传播的各种机制，明初的严酷统治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使文化传播受到了不少负面的影响。这一切，直至晚明时代，才得到根本的改变。晚明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时期。迅速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古老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激荡于思想界的王学与传统的儒家陈规、追求自由和享乐以及个人独立的人生理念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遗存之间，总之，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开放和保守，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冲突。文人们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中经受了新的洗礼。各种思想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文化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除了传统的演剧、讲史、宣讲小说以外，出版传媒也呈现出少见的繁荣。书院讲学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文人结社的情形。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巅峰，插图本、评点本等等，都为这一巅峰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晚明时代的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切入点，无疑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把握准，首先就准在这一切入点上，它可以让作者充分地展现个人的学术才华，在十分有限的篇幅中，把晚明时代作为一个特定的个案，可以很自由地纵笔游刃有余其中，解剖那个时代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也正因作者把研究对象把握得相当准确，才为全书的较高学术质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还很鲜明地体现在书中的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之中。这一点，是对一部学术论著的基本要求，但有的人就是很难做到。他们不是无限拔高，就是极度贬低，忽左忽右，忽高忽低，主观随



意，率性任情，视学术为儿戏，很不负责任。例如，在对冯梦龙和“三言”的评价上，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存在着一种无原则的溢美。有人不顾事实，把“三言”的著作权奉送给冯梦龙。而事实上，冯氏仅是“三言”的编纂者。尽管他在将120篇小说汇集后编入“三言”时对它们做过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但仅仅是艺术加工而言，而不是原作者和创作者。很明显，编纂者和著作者完全不是一回事。现经学者研究，所有辑入“三言”中的小说，只有《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另有五六篇小说有可能是冯梦龙创作的，但目前尚未寻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而只能存疑。除此以外的绝大部分“三言”中的小说，皆为书会才人或市井艺人所作，我们怎能把“三言”的著作权一股脑儿地全部给冯梦龙呢？称誉冯梦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依据又在哪里呢？也有拼命贬低的例证。凌濛初是“两拍”的作者。书中的近80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他个人的创作。尽管他在创作中也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吸取了大量的题材作为创作的依据，但至今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否定他的著作权。然而有人却千方百计地贬低凌濛初的文学贡献，不是说他“反动”（因为他曾参与和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事实上不是如此。已有论文对此作了有力的批驳），就是说小说“缺乏艺术性”，等等，就是看不上眼。这样的“研究”，难道是公允的吗？

而聂著却避免了这种对学术很不负责任的研究。他是一个老实人，实话实说，实事实做，既不胡乱赞扬，也不任意批评，尽量做到有一说一，以事实说话，在我看来，大致达到了准确的评价。例如，对晚明文化，学界甚为流行一种观点，即在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以王阳明“心学”为核心观念，盛行着一股进步的晚明思想潮流。其基本的特点是：尊重人的个性发展、追求现世人生享受、强调心灵充分自由，推崇精神解放的不拘一格。这股进步思想潮流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李贽思想影响下，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文人，甚至结成社团，互相呼引，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趋向决裂的方向前进等等。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聂付生也接受了这些看法，但却又保持着很清醒的头脑，对时髦的流行的学术观点有独立的思考，绝不人云亦云，随声



附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在首章的导语中有一节概括性的论述，可说是全书主要观点的结晶：“晚明文人生似乎都在解构中国封建文化，在觉醒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等方面做着努力，但是，他们往往又在解构的地方重新建构起一套旨在敦化社会风气的伦理道德。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态一直支配着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极不协调的‘二律背反’像李贽、何心隐辈以死相争者，毕竟少之又少。大多数或回归传统，继续张扬程朱理学，寻求‘实学’救国的新道路；或缩于一隅，以文娛心、以文娛世，在一种悠闲自适的意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因此晚明文人的传播心态也呈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格局。”这段话说得多好呵！尤其是“但是”以后的一些看法，近年来我们已经很少能听到了，然而谁能说它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事实呢？类似这样的论述，在他钟爱的冯梦龙的评价中也能找到。这种对研究对象的“两分法”，无疑体现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种独立思考，有个人见解的研究确是我们应当努力提倡的。

诚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也是很不容易的。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只有在具备充分的依据后，我们才能大体做到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准确，评价公允。且不说“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吧，但至少应把结论建立在有确凿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持，作者在写作此书是这样做的，因而这部论著的学术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更多的例证已用不着我在此再多饶舌，看过此书的读者想必和我皆有同感吧！

视野广，这是我在读了《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一书后得到的又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据学者们的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三个“轴心时代”。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代希腊时期，为第一个“轴心时代”。在此一历史时代中，中外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例如，思想自由，学术繁荣，诸家峰起，百花灿烂等等，有力地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第二个“轴心时代”，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代表，我国的晚明时期也正与其相当，两者的思想文化成果完全可以互相媲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轴心时代”在我国的时间不是很长，然而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聂著虽然没



有提到“轴心时代”的理论，但在客观上却站立于这种理论的前沿来臧否晚明文化。为此，作者特设第五章：“世界视野与传统习惯”，强调了“两种文化传播的心理扫描”，认为我们在研究晚明文化的传播时，千万不可忘记了西方文化对它的深刻影响。当“我们考察明末中西文化传播时，首先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动态的、互为影响明文化现象，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剔除一些因民族情感而生的感性因素，正确认识晚明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人在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学术走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然而他认定，异质文化的这种交融工作是以接受、认同中国文化为起点的。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为我们带来了先进文化，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布道生涯也是穿上儒服进行的。要把一种异质文化传播到本土，传播者首先得适应和了解本土文化，对本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须作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先求生存的基础上再求发展，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论述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也正因此，我们读聂著，就如同在品鉴学术的美味佳肴那样，有一种回肠荡气和回味无穷的感觉。

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晚明文化，两者的交汇和融合一目了然。即如晚明时期的杰出思想家李贽而言，就和利玛窦有过密切的来往。他的以童心真性为核心的思想体现中，不时闪耀着西方先进文化的光彩。聂著正确地指出了晚明文人心中深深的“西学情结”，把他们的思想文化心态和西方世界结合起来，打开了一条晚明文化和世界文化联结的通道，这就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及时地呼吸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空气。聂著如此宽广的学术视野令人想起了一个真理：文化不仅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没有世界的文化，怎能奢谈民族的文化？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聂著专设“中西文化交融的先驱”一节，以徐光启为个案，对晚明时期的一些先进知识份子在传播西学中的历史贡献作了认真的论证。他们凭藉文人的敏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并且通过翻译文本的方式把它们引进中国，让更多的国人接触和感受当时的先进文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实践中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达到“救国”之效用。这类例证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从而也可见聂著学术视野的宽广，决非是我个人对它的溢美和吹捧。



文化的传播具有复杂的机制。从文化的生成系统来说，传播也许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然而，我们又不能单纯地对文化的传播作研究，而置整个文化的生成系统而不顾。那样的研究仅是浮光掠影的惊鸿一瞥，为我们所不取。论者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使这部即将面世的新著既有平面上的广度，也不乏立体的深度，纵横交叉，为人们提供了较好的精神食粮。

据我的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生成系统，它至少有以下三个子系统组成：文化的创造、传播和接受。就最著的研究对象——晚明文化而言，它也应包括这三者。晚明文化（按：这一系统的组成十分复杂。这里所说仅沿用最著的概念而言）的创造者是晚明文人，而它的传播者主要也是它的创造者，作者关注的主要是它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方式，还有它的接受者。三者缺一不可。从此书的书名来看，作者的叙述重点在前两者，也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机制和方式的考虑。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部论著如果没有论述的重点，也就难以获得成功。重点太多，也就失去了重点，或者说是没有重点了。然而，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读完全书，总觉意犹未尽。也就是说，对文化生成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文化的接受者的论述，全书着墨不多。也许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缺憾，在书的结束写了一章“余论”，对“晚明文人的文化效果”作了初步的评估。这里既有“清初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也有“文学范式的巩固与新变”，还有对“文化传播的副作用”的剖析，似乎面面俱到，考虑得相当周密。然而在我看来，它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例如，清初学术的主旋律应是实学，这里固然有着晚明文化的影响，但就它的主流而言，清初学术的渊源恐怕并非主要受到晚明文化的熏陶，或许说是它对晚明文化的反拨和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回归等等似乎更为恰当一些。再如，对晚明文化中的重“私”思潮，作者认为是“文化传播的副作用”所致而给予了批评，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私欲的膨胀固然对社会的世风带来了腐蚀，但那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必然表现。从根本上来说，晚明时代强调“私”欲，有利于冲破传统理学的樊篱，把个人从群体社会拉向现实，从而为尊重个体的人本主义新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质是进步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用“文化传播的副作用”来做批评，显然缺少说服力。这类看法在书中还有一些。



尽管它们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倘若能对此作更加慎密和深入地思考，或许可以避免引起歧见。坦率地说，作者在这里的出发点是把这些问题作为晚明文化的影响来评估的，而不是从文化生成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文化的接受者——来论述的。这就更让人感到可惜了。

付生兄来自湖南的乡村，一路上从艰难的生活中走来，而立之年，负笈上学，四处奔波，从农家小屋走向东北，又辗转来到江南，最后落足于杭城。浪迹的生涯锤炼了他的顽强意志，广泛的阅历增进了他的人生感悟。四处求学使他兼收并蓄，融会了南北东西的学术之长。这些都是他的难得的学术资本。在这部摆放在读者面前的新著中，我们透过它的字里行间，无疑能读到他的这些优长。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和积极上进，刻苦攻读和谦逊自律，这或许也是这部论著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吧。

我和付生兄的交往时间不长，然而对他的人品和学术皆很钦敬。有感于他的盛情，东拉西扯写了以上的一些文字，算是对《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一书的一点读后感。好在他是个实在人，也许不会计较我的失察。实话实说，权作完成了一次挚友的嘱托、交差了事吧。

草成于上海灵广花园“四树斋”。时为盛暑，其热难当。

2007年7月18日

张 兵（1947— ），男，上海市人，《复旦学报》编辑部编审兼国家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前言

晚明文化传播信息网的形成与文人的作用

晚明社会的“天崩地解”，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上的，周作人所称的“王纲解纽”（《近代散文抄序》，《苦雨斋序跋文》），就包含着这两层意义。出现这种局面，只有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具有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文人传播集团、并形成波及全国、能伤筋动骨的传播信息网络才能做到。晚明是否有具有构筑这个信息网络的文人群体？这个信息网络有何特点？由哪些传媒构成？传播机制如何？文人在传播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有何效果？等等。这些都是本课题想着力解决的。

文化革命，首先是传媒的革命。因为主宰文化走向的文人，主要依靠媒体传播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传媒的发达程度与文人的传播速度是成正比的。现代如此，古代也不例外。通过浩如烟海的史料梳理，我们发现：晚明传媒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传统社会中几种重要的传媒都在这一时期谱写着它们的辉煌。

刻印、藏书、讲学、演剧、文学评点、结社、官方邸报等都是晚明文人的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载体不同，其传播机制也不一样，对社会的影响也有深浅快慢之别。

刻印，从万历开始，成为影响社会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体，它刻印了包括文人、官僚、市民各阶层在内的所有读者群所需的读物，尤其通俗读物的刻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这些通俗读物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



应，让刻印出版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类作品的策划、编撰和刊刻之中去。有些书坊专以刻印通俗文学刊本为特色，突出品牌，形成比较稳固而强大的读者群。这类的书坊有富春堂、继志斋、万卷楼周曰校、环翠堂、师俭堂、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大业堂、天许斋、叶敬池、衍庆堂、墨憨斋、容与堂等，其中专以刊刻戏曲的有富春堂、继志斋、师俭堂、文林阁、墨憨斋等，他们刊行的《牡丹亭》、《拜月亭》、《琵琶记》、《红拂记》等都是传世的名篇；而万卷楼以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世德堂以刊刻《西游记》、天许斋、叶敬池、衍庆堂以刊行“三言”而成为书坊中的知名品牌；杭州武林容与堂专刻李贽的作品而享誉天下。

伴随刻印风行的是书肆的产生。可以说，晚明有非常成熟的图书市场，这些市场培育了一大批书商，他们走南闯北，为图书的流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福建《长汀方志》载：长汀县的四堡以刻书为生，形成刻印发行一条龙服务。他们经营通俗启蒙读物为主，“城市有店，乡以肩担”，售书为业者达百家以上，而销售之地“几遍天下”，形成的庞大销售网达百年之久。湖州的图书销售更为兴旺，其“书船”沿水路销往各地。据同治《苏州府志》和荃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载，毛晋以高价购买善本的消息一经传开，“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①。所以，正如乾隆时人张鉴《瞿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吾乡固多商贾，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扁舟孤棹，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简籍不胫而走。盖自元时至今，几四百载，上至都门，下逮海舶，苟得一善本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②由于它流动性大，凡能行船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所以，“书船”是书肆的重要补充，它的功用和贡献绝不亚于书肆。这些书商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采用各种手段，大作广告。或利用牌记作广告，或请名流题序，或改编翻新，或考究装订。这些措施的运用，加快了图书的流通，扩大了图书的影响，是当时文化传播中最为便捷的一种渠道。只要粗通文墨者，皆能从中受惠。

晚明书院的文化传播远比当时的学校所传播的文化要深入人心。其

^① 转引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② 转引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4—605页。



时心学盛行，曾一度成为“思想界的时尚”^①，王门弟子尽管对老师的学说发挥不一样而形成不同的学派，但到处创建书院以弘扬老师的“致良知”之学却是共同的。他们采用种种灵活的、与本学术相协调的讲学方式，渗透或影响着晚明社会的各个领域。书院讲学成为晚明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具体表现在各立门户，收徒讲学。《明儒学案》卷37云：“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这两个学派的学术发展，推动了书院的勃兴，讲学之风也由此开展得如火如荼。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他曾在江浦县建新江书院，在南海县建云谷书院，在番禺县建天关书院，在增城县建明诚书院、独冈书院、莲花书院。他依傍这些书院广泛传播心学理论，产生很强的社会效果，他所到之地，“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兴起者甚众”，“从游者殆遍天下”。王守仁一脉影响还要大得多。他本人每至一处，必建书院以收徒讲学。在他的影响下，其门徒自成体系，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传播心学的网络系统。出现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数派，而这些弟子都把建书院作为发扬学术的主要环节。浙中王门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舍皆有讲舍”；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据《江西地方志》记载，江右王学在明后期至少有30所书院在传播王学。如南昌的正学书院、新建的丹陵书院、罗溪书院、丰城的莲槎书院、高安的筠阳书院、庐陵的青原会馆、西原会馆、景贤书院、泰和的求仁书院、吉水的仁文书院、崇桂书院、江阳书院、泮东书院、永丰的云邱书院、安福的复古书院、复贞书院、识仁书院、任仁精舍、莲花的复礼书院、乐安的道乡书院、南城的明礼书院、正学书院、贵溪的严家书院、德兴的绪山书院、德化的嚶鸣书院、赣县的阳明书院、于都的濂溪书院、瑞金的绵江书院等等（光绪《江西通志·建置志·书院》及同治《江西各府府志》）。书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15页。



院遍布全国，成为晚明学术探讨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晚明理学深入人心，甚至走进普通百姓家，书院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演剧是晚明文化传播另一重要渠道。它的传播形式较书院和出版等更为灵活，在广大曲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下，晚明社会形成了一套以文人创作为主导、家班演出为主体、民间团体为补充的传播机制。具体而言，从万历年间开始，戏曲创作和理论探讨成为文人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围绕着沈、璟两派的论争，“嗣后作者，波委云属”^①，出现了卜世臣、吕天成、王骥德、汪廷讷、叶宪祖、史槃、顾大典、徐复祚、许自昌、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沈自晋、梅鼎祚、屠隆等一大批传奇名家，这为家班和其它演出团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当时凡是有声望、有钱财的主顾争相蓄养或雇用家班，并蔚然成风。这些家班演出一般只供家人、朋友、亲戚等于己利益相关的人欣赏，传播的范围毕竟有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班广泛接触社会，把一些精彩的曲目普及到民间。崇祯七年（1634）中秋之夜，张岱在戴山亭举行戏曲大会。与会七百余入，能唱戏曲者百余人，同唱《浣纱记·采莲》[念奴娇序]（锦湖万顷）之曲，声如潮涌，山如雷动。又命其家茂苑班小僮芥竹、应楚烟等人，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②。除此，他还居然把戏班带进寺庙，让那些远离尘世的“寺人”也分享戏曲带来的欢乐^③。张岱在传播戏曲文化方面确实功不可抹。潘之恒《初艳》记载，万历三十至万历十四年，他在南京主持的戏曲演出达百余场。而这些戏曲演出任务主要由他家训练有素的家班承担^④。

家班如此，民间戏班的流动更为频繁，传播更为广泛，影响更大。侯方域《马伶传》曾记明末金陵徽商设宴演戏盛况云：

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世，人易为乐，其

① 邹式金《杂剧新编·小引》，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

② 《陶庵梦忆》，上海书局1982年版，第62页。

③ 《陶庵梦忆》，上海书局1982年版，第4页。

④ 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页。